

审时度势 郭良平

终结“伟大领袖模式”

无论俄罗斯自认为理由多充足、目的多正当，从任何角度来衡量，普京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，一开始就是一个败局，甚至有些不可理喻。像他这么一向精明的人，做出这种重大决策失误，一个合理的推测，是俄罗斯最高决策圈子的状态极不正常。很可能普京收到的信息是扭曲的，他一个人钻牛角尖时，无人提醒和纠正他，却一味附和他。

也就是说“伟大领袖模式”出问题了。这个模式出问题是必然的，问题也必然是灾难性的，往往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为“伟大领袖”的执拗买单、为他的倒台垫背。这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。

近二三十年来，世界政治的一个趋势，是民主退潮和强人政治纷纷在各国粉墨登场。它反映出来的并非民主和威权制度的优劣，而是这个巨变时代对领导力的要求。怎么有效、持久地满足这个要求，是民主和威权这两大类型政治制度都没能解决好的难题。民主政治内部激烈的纷争使决策跟不上形式，甚至出现瘫痪。强人政治往往一时表现得很有效率，但必然陷入最高领袖自负自恋中的独断专行，最终出现普京这样的颠覆性错误。

“伟大领袖模式”不仅仅是高度集权下的个人专断，更重要的是神化最高领导人（对此模式的概括，见本人2020年7月24日在《联合早报》的文章）。过去的皇帝只要靠着血脉正统，上位程序合法就行，而“伟大领袖模式”中的最高领导人却必须无所不能，无处不是权威，无事不能发“最高指示”。长期高高在上，就会自以为是，也必然会使周围所有人都变得服服帖帖、唯唯诺诺，于是再无实质意义的政策讨论。一人错则全盘皆输，这是“伟大领袖模式”的通病；自视为“伟大领袖”后，就绝不认错，宁可去死也不接受失败，这是“伟大领袖”的宿命。

中俄两国都有长期帝制专制历史，现代史上又都出现过“伟大领袖”的灾难。两国在民主政治上都处于启蒙状态，又都碰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。因此，回归“伟大领袖模式”的惯性、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基础都很强。
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民主的道路一直不顺，民主政治难以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。普京集权下的雷厉风行反而更对多数民众的胃口，他的支持率一直很高。但俄罗斯有定期的大选，普京也必须努力赢得选票。

中国的历程非常辉煌，但也非常不一样。它保留了斯大林式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。在这个框架下，无论是谁坐上了最高位置，都有可能一步步地将枪杆子、刀把子、笔杆子、钱袋子和乌纱帽子都尽收囊中。一旦做到了这一切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并且执政时间越长，地位就越巩固，想不当“伟大领袖”都不成。

出皇帝庸官的风水

除了有定期选举，俄罗斯也比中国有更多言论和抗议示威的自由。普京一年一度的马拉松式记者会，恐怕还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胜任。

在常态下，中国的政治文化在社会上是“官本位”，“青天大老爷”“父母官”“为民做主”和仇官、怕见官的混合传统；在官场内是裙带关系、家臣，“跟人不跟线”“朝中有人好办事”和不显山露水得罪人的处世哲学。这是出皇帝、庸官而不是“伟大领袖”的风水。

然而，中国目前急需一个伟大领袖。

这个模式出问题是必然的，问题也必然是灾难性的，往往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为“伟大领袖”的执拗买单、为他的倒台垫背。这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。

这么一个复杂多样的大国和庞大的国家机器，都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把舵。但真正的伟大领袖可遇不可求。中国的官僚个个是人精，自视甚高、野心勃勃，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小皇帝。能够压住阵脚是一把手的第一要旨。

胡锦涛的疲软导致了腐败蔓延，寡头林立，“政令不出中南海”，以及“九龙治水”的乱象。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国内状况，习近平花大气力收权，惩治腐败，狠抓吏治党建和依法治国，重塑民族精神，光大中华文化，推动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定位的改变，拼命想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思想和制度基础。这些都须要高度集权和高压来推动。卧薪尝胆，甘苦自知。

然而这些不是靠“伟大领袖模式”能完成的。中国的长治久安需要的是建立一整套有效、有力和可靠的议事决策的常态机制，而不是孤军奋战的个人英雄主义。

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，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，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。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、按道理、按常识、按制度、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，就是论事不论人。世俗化就是摒弃“伟大领袖模式”，不靠救世主和神仙皇帝，在法律、制度、程序和公理、常识、良知面前人人平等。

政治现代化的“四公”

但“伟大领袖模式”强调盲从和愚忠，搞个人专断而不是群策群力，搞不懂装懂而不是借力打力，搞凡事亲躬而不是赋权代理，搞举轻若重而不是举重若轻。政治现代化就是要用建立在科学民主理念上的公理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“四公”，来取代围绕着“伟大领袖模式”的“四个意识”“两个维护”“绝对忠诚”等低水平和基本无效的口号。

在个人层面上，现代政治家的基本功首先是学会挨骂，因为挨骂不仅不可避免，也是全面掌握情况和动向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。其次要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互动，能脱稿讲话、直面记者提问、平等待人又不乏幽默感；能站在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利益的角度看问题。在全球化、高科技时代，大千世界卧虎藏龙，更不能冒充权威。要当个凡人，通过平常心、平等讨论、与民共情等，来发挥领导作用。这才是现代化政治。这些对中国前呼后拥、等级森严的各级领导来说，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
前面提到，民主和威权这两大类型政治制度都没能解决好领导力的难题。但中国的机会不错。这些年来，许多西方国家陷入了政治正确的泥潭，它们将自由民主当作一种定型的、神圣的教条，在唱高调中无法自我改进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“威权制度”虽然饱受攻击，却在不断调整、不断进步，确保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，环境持续改善，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强调的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。它同时还保留了决策和行动力，以及长期规划，动员资源和调试总结的能力。

这是因为中国不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将具体制度神圣化，而是只关注结果——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、有利于经济发展、综合国力的增长、环境的改善、社会的稳定等等。在目标驱动下，中国的制

度保留了自我更新的能力，包括执政党。相比之下，在中国引入现代民主本来就困难重重：孙中山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。现在民主政治又出现了三个新情况——社交媒体、身份政治和贫富不均。三者使美国这个最成熟的民主制度都难以顺利运作，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，中国会走上这条路。

大一统容易掉入陷阱

虽然中国体制的集中统一、步调一致，在纷乱和方向不明的世界上的优势明显，但它却有创新和活力不足的弱点，也有逐步陷入僵化的可能。中国正处在探索创新活力与大一统效率相结合的体制的阶段。新体制不能按照“伟大领袖模式”来画框框，一锤定音，因为百年巨变的世界是动态的，是任何主义、思想、理论的框架都定不死、框不住的。建立新体制的关键，是如何随形势变化不断达成和更新全民共识。中国缺少的，正是凝聚广泛共识的有效而可靠的机制，议政不足是当前中国体制的弱点。

大一统容易使国家掉进“伟大领袖模式”的陷阱，但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大一统的官僚制国家，比西方早了1800年。老祖宗也没有民主，也同样面临议政不足和僵化的问题，但他们早就有了制度性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是谏议制度（或称言官制度）。

相传于舜帝时，已有“纳言”一职，商汤王时已有“司过之士”——皇帝有过错，可以由“司过之士”指出纠正。周以后各个朝代都设有言官或谏官，他们通常品级比较低，但地位和作用独特。除了朝会外，他们还可以列席宰相和皇帝的会议，直接监督皇帝。“言者无罪”是言官的特权。几千年中，谏官群体形成了独特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各个朝代都有名臣出自其中。“犯颜直谏”是谏官的精神传统，他们为了当“诤臣”、名垂青史，争相挨皇帝打板子，甚至不惜把命送掉（本人2018年3月21日在《联合早报》探讨过中国古代的谏议监察制度）。

很可惜，中国近现代历次大革命将这个光荣传统也革掉了，但它也许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制度补遗，而且不像西方选举民主，它在中国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，应该能够恢复过来、发扬光大，成为可贡献于世界的“中国智慧”的一部分。如果这个制度还在，像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也许就可以避免；彭德怀也不至于被打倒并整得很惨；毛泽东也不至于在个人崇拜声中一意孤行，不仅给国家、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，也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，郁郁而终。

正如邓小平所言，国家和民族不能将宝押在某个人身上，要靠一个好的制度来长治久安。在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目标，是形成一个可靠的机制，使任何人当权都无法造成颠覆性破坏；当真正伟大领袖出现时，也能够充分发挥作用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要保证政权运作稳定，有效率和可预料性，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事供应保障。为此，“伟大领袖模式”须寿终正寝，以真正实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
高级研究员